

(1904),石鼓书院改称南路师范学堂。民国期间,石鼓书院改为女子职业学校。遗憾的是,1944年6月,书院故址毁于日军炮火。2007年,石鼓书院得以重修,这为彰显和

弘扬石鼓书院人文精神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我国教育界和文化界的一大幸事。

(作者为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DOI:10.13914/j.cnki.cn43-1453/z.2016.01.042

世界历史视野中的湖湘文化

——以汤因比、塞缪尔·亨廷顿之文明理论推演

国春雷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将世界文明分为26种,针对人类文明的起源,提出了著名的“挑战与应战”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第一代人类文明源于人类成功地应对了来自恶劣自然条件的挑战,从而诞生了人类社会最初的几大母体文明;第二代、第三代人类文明源于人类成功应对了来自人为环境的挑战,诞生了形形色色的子体文明。

汤因比认为,任何文明犹如有机体,都会经历起源、成长、衰落、解体四个阶段。一个文明在诞生之际,首先会涌现出少数具有创造性的人物,锐意改革、打破传统,积极应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他们的行为被大多数人模仿,从而推动文明诞生或进化。反之,如果少数具有创造性的人物不思进取且各自为政,大多数人无所事事亦无所适从,外部文明虎视眈眈、伺机而动,那么这种文明就会步入第五个阶段——死亡。以近代中国观之,清王朝腐朽堕落,面对西方基督教文明和日本文明的冲击,国内太平天国要改朝换代的威胁,只能左支右绌、疲于应付,中华文明到了衰落、解体的边缘。及至清廷覆灭,各地军阀在诸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相互攻伐,广大人民一盘散沙,中华文明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正是在这一时刻,作为中华文明子文明的地方文明,纷纷走上历史舞台,为拯救中华文明,破旧立新、救亡图存。史实证明,“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湖湘文明(狭义上的湖湘文化)在中华文明诸多子文明中脱颖而出,博采众长、不断创新,最终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推动中华文明攀上新的高峰。

深受湖湘文明影响的湖南杰出人物,大致从五个时期促进了中华文明的进化。第一批为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派,以魏源为代表,提出“开眼看世界”,号召“师夷长技以制夷”,开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之先河;第二批为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军事派,以曾国藩、左宗棠、刘坤一为代表,用程朱理学和王夫之倡导的经世务实作为指导思想,组建湘军并开办洋务来挽救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湘人以天下为己任”、“无湘不成军”之说自此享誉中华;第三批为戊戌变法时代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谭嗣同、唐常才、杨度为代表,舍生忘死、前赴后继,试图用君主立宪的方法拯救中华文明;第四批为辛亥革命至民国初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黄兴、陈天华、宋教仁、蔡锷为代表,主张模仿西方,建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五批为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为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了崭新的中华文化。

由上述史实可见,于19、20世纪面临内外挑战的中华文明,在其子文明湖湘文明的主导下,积极应战、不断调整、时时创新,最后终于浴火重生,再次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毛泽东思想是新的中华文明的典型表现形式,不仅被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所接受,还几度走出国门,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文明。汤因比一直赞叹中华文明的持久性,称之为“独一无二”。从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中可以窥见,其经久不衰的奥秘,或许正在于这种母体文明中含有众多形态各异的地方子体文明。这些子体文明沿着各自的轨迹发展,某一子文明在适当时刻如果恰好迎合了时代需要,便会上升到中华文明的主导位置,赋予其全新的内容和形式。换言之,多样性和差异性中华文明动力与活力的源泉。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坦承,西方在近代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和宗教,而是通过有组织的暴力行径。由此可知,相对“落后”的湖湘之地在近代之所以能够独领风骚,大概正是因为该地区不仅接受了传统的中原文化,还保留了山民独有的刚劲与血性。那么,曾经力挽狂澜、拯救并推动中华文明进化的湖湘文明,在新中国成立后是否还能主导中华文明?

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巨人的形象为世界所瞩目,而中华文明也因此迎来了新的挑战。塞缪尔·亨廷顿指出,世界在二战后转向多文明发展阶段,文明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而亚洲的经济飞跃并不会为当地带来和平,相反会引发新的冲突。他认为这些冲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腾飞促使亚洲国家纷纷加强军事装备,从而刺激地区的不稳定局势;亚洲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冲突日益加剧;中国崛起会引发周边国家的不安,从而恶化亚洲政治环境。结合这三方面的危机,他针对中国提出了“均势和搭车”的理论,前者指亚洲国家联合起来制约中国可能发展的霸权,后者指亚洲国家追随可能出现的中国霸权。

根据塞缪尔·亨廷顿的推测,未来世界最主要的文明冲突可能发生在西欧与伊斯兰世界、美国与中国之间。在国际上,冷战阴影、历史积怨、领土纠纷、贸易竞争、军备竞赛、文化差异,都有可能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爆发冲突的节点。而在国内,民主化建设、贫富分化、民族矛盾、产业升级与调整等问题也对中华文明发起严峻挑战。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基本摆脱了中世纪帝国的传统思维,接受并持续创造着现代化的世界文明,在经济、

政治、文化、民族、宗教等领域均取得重大成就，积极与世界其他文明发展这些领域间的友好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正确发挥湖湘文明的基本精神，中华文明应该能够应对上述来自国内外的挑战。学术界将湖湘文明的基本精神归纳为“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这其中实质暗含了理性与感性统一、实事求是、运动、发展和变化的唯物辩证法。更重要的是，湖湘文明将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效地结合起来，这是中国以和平大国身份崛起于世界东方的重要思想根源。

综上所述，作为中华文明子文明的湖湘文明，如果要

保持活力，继续执中华文明之牛耳，窃以为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接受其他文明成果的同时，不应迷失自我，应强调、坚持自身文明的独特性，保持湖湘文明的典型特征；第二，保持自身文明特征不等于固步自封，湖湘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求新求变，应该时刻反思，以旺盛的创造性积极应对变化莫测的世界；第三，避免走极端，一方面不能迷信经验、固执己见，一方面要防止盲目地争勇斗狠、蛮横霸道。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DOI:10.13914/j.cnki.cn43-1453/z.2016.01.043

衡阳抗战文化

刘国武

抗战时期，衡阳扼两广咽喉，是连接大西南的交通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武汉、广州沦陷后，衡阳一度成为大后方的物资集散地，通过川湘水陆联运业务，衡阳的军需民用物资可直达重庆等大后方。衡阳在战时成为大后方仅次于重庆和昆明的第三大工商业城市和财政金融中心，被誉为“小上海”。南岳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一度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在地和指挥全国抗战的军事中心之一。在这里，蒋介石先后召开了四次南岳军事会议，国共两党共同举办了南岳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并筹建了纪念抗日阵亡将士的烈士陵园——忠烈祠。衡岳还是一座文化重镇，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等学校迁到衡岳。一时间，政界、军界、学界名流云集衡岳。1944年在衡阳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惨烈的城市争夺战，让世界知道了衡阳、认识了衡阳。战后建立了中国唯一一处抗战纪念城——衡阳抗战纪念城。因此，战时衡阳是全国的一个军事指挥中心、大后方的经济重心、文化重镇和抗战名城。

一、衡阳保卫战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5月28日，在日军围攻长沙时，蒋介石令第10军守卫衡阳。第10军军长方先觉，全军17600人。方先觉到达衡阳后，立即疏散了衡阳城内的30万民众，炸毁了湘江公铁大桥，破坏了衡阳机场，做好放手一搏的准备。方先觉在衡阳城南面和西南面构筑了整体性和空间性极强的防御工事，其中的绝壁工事——“方先觉壕”后来被美国西点军校收入到教科书中。当时进攻衡阳的是日本的第11军第116师团和第68师团（后增加到5个师团）。

1944年6月22日，日军飞机大规模地轰炸衡阳，拉开了衡阳会战的序幕。次日敌第116、第68师团分别从衡阳城的西边和西南面、南面向衡阳发起攻击。日军除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外，还不断向守军施放毒气弹和燃烧弹。中国守军利用交叉火力和绝壁工事，用手榴弹和刺刀一次又一次地将敌人击退。在攻防战中，尤以张家山的争夺战最为激烈。在日军的第一次总攻中，第116师团第133联队向张家山阵地连续猛攻20来次，阵地先后得失达13次之多。在日军的第二次总攻中，日军第133联队在三昼夜中

向张家山狂攻12次，其中有10次攻进阵地的激战场面。坚守张家山的是预10师第30团，该团经过连续的苦战和恶战，被打光了。战至7月13日，前后增援张家山阵地的6个连全部阵亡。最后日军用炮火把这座山丘削去了10米高，整个工事全部被毁后，才占领这个山丘。日军第133联队共3000人，战到最后只剩下250人，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在五桂岭争夺战中，半日内连升了5个营长，均全部牺牲。五桂岭、外新街、岳屏山、西禅寺等阵地的守军全部壮烈殉国。8月8日，衡阳沦陷。

衡阳保卫战的激烈程度、残酷性和惨烈性为抗战以来所罕见。中国守军要克服长期作战所带来的疲劳、饥饿、酷暑、伤痛、缺粮、缺弹药和药品等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与敌军血拼。到7月中旬以后，不但衡阳守军伤亡惨重，而且粮弹匮乏。城内士兵只能吃烧焦的米煮成的糊饭，以一杯盐水下饭。受伤士兵无药品治疗，伤口因污染而发炎、化脓，溃烂生蛆者不可胜数，重伤者无法救治。

衡阳民众对衡阳保卫战作出了重大贡献。会战打响前，23000余市民组成弹药队、工事抢修队、消防队、伤病服务队和收尸队等，其中“配合作战、构筑工事之民夫，葬身枪林弹雨中者，即达3174名”。衡阳城破时，尚有1000余支前民工，最后都被日军俘获。

持续48天的衡阳保卫战是“豫湘桂战役”中的一场硬仗，是整个战役溃败中的“闪光点”。是中国守城将士为了捍卫民族独立与自由同日本法西斯进行的一场殊死的血战，它延缓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步伐，消耗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中国守军第10军共伤亡15000多人，其中阵亡近8000人，伤7000余人；日军方统计伤亡19380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资料显示：“日军死伤超过70000人，其中48000人被击毙；中国伤亡15000人，其中7400阵亡。”日军认为：这是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此役“牺牲之大，令人惊悚”，是“苦难的战役”。

衡阳保卫战已经过去了71载，当年在衡阳抛头颅的英烈们长眠在衡阳这块土地上，战后余生的英雄今天也已经大多不在人世。但当年衡阳军民喋血孤城的牺牲精神可谓惊天动地，泣鬼神，炳彪千古，受万世景仰。概括起来，这